

主体间性视域下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以《红高粱家族》为例

薛晓宇

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9;

摘要: 自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 葛浩文作为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的译者受到了学术界与日俱增的关注。他精湛的翻译技艺助力中国文学跨出国门, 对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过, 不少人认为其翻译风格有悖于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葛浩文的翻译实践, 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 探讨他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与原作者、目标读者、出版商等多方主体进行互动与协调。

关键词: 主体间性; 葛浩文; 《红高粱家族》译本

DOI: 10.64216/3080-1516.25.04.048

引言

自主体间性的概念提出以来, 各界对于该概念有了不同的阐释。知网输入“主体间性”, 显示对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 却很难看到翻译相关的字眼。葛浩文, 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敏锐的文学感知力以及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 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胡安江, 2010)。葛浩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中所展现的“创造性叛逆”, 彰显了他在连接作者、原作与读者三者之间的主体性。因此, 通过深入研究其翻译代表作《红高粱家族》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表现, 探讨其如何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 在与其他翻译主体的有效互动, 扩展学界对于主体间性在翻译领域的研究, 并成功构建起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进而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

1 译者主体间性的解析

主体性是现代哲学和美学的命题。17世纪, 笛卡儿提出唯我论, 不承认人的社会性。20世纪, 西方哲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胡塞尔通过摆脱唯我论的困境, 提出了主体间性。伽达默尔认为解释活动是主体间的对话和视界的融合。哈贝马斯则将交往理论中自动孤立的个体转化为相互关联的主体, 使主体间性理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逐渐得到升华。主体间性通过相互公式化、渗透和相互依存, 揭示了人、人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以及自我与客体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根据主体间性理论, 认为在翻译活动中存在着相当多的主体, 如作者、译者和读者。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上的(张孝红, 2019)。如何在这几个因素中斡旋, 做到即忠实原作思想、符合读者预期

而且可以为市场所接受, 是每个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葛浩文的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再现, 更是文化意义的重塑和创新。由此, 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红高粱家族》的过程,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责任, 以及如何在忠实原作、满足读者、适应市场之间实现艺术与智慧的平衡。这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也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2 译者与作者: 精神的共鸣

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符合译者的精神选择。在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 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审美关系。译者选择翻译谁的作品、翻译哪部作品, 取决于译者与哪个作家或作品形成的审美关系(张孝红, 2019)。正是从中国作家的作品中, 西方读者喜欢阅读和讨论的亮点显露出来, 葛浩文由此成功地与中国作家建立了审美关系。

例1: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 精忠报国, 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 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在进步的同时, 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译文: I didn't realise until I'd grown up that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is easily the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repulsive, most unusual and most common, most sacred and most corrupt, most heroic and most bastardly, hardest drinking and hardest-loving place in the world. They killed, they looted, and they defended their country in a valiant, stirring ballet that makes us unfilial descendants who now occupy the land pa

le by comparison. Surrounded by progress, I feel a nagging sense of our species' regression.

这是莫言写在小说开头部分的一句话,也是对于这篇小说最完整的概括。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无数英雄好汉,如留罗汉、“我”的爷爷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奶奶,在当时复杂的局势环境下,他们以其血肉之躯对抗天地人事,困难无法压弯他们的腰反而让其生命更加坚韧。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将一系列的“最”译为“most”,按照原文的句式排列,颇显示出英雄豪气的气势来,才使得“我们”这些后代与顽强的先辈相形见绌。其次,译者将先辈所做的英雄事总结为一个“stirring ballet”,概括了先辈们的不易,而原意为“芭蕾”的“ballet”有种在争斗不愿低头、与死神共舞的优雅。正是如此,葛浩文在小说开篇便精准地捕捉并传达了那种宏伟壮丽、豪迈激昂的叙事基调,他对莫言笔下东北高密的理解,使得他的翻译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原作的韵味和精神。

3 译者与读者:文化交融与适应

译者的最终成果与价值评定离不开读者,一篇好的翻译作品,不仅是由学术界界定的,最重要的是得到受众的肯定。如何能将中国的作品,在不丢失其韵味和思想的前提下,使目的语读者也可以体会到原作的精髓是葛浩文要面对的难题。

3.1 避讳

在中国文化中,避讳是一项深具传统色彩的习俗。在翟理斯翻译中国古典笑话集《笑林广记》时意识文中存在大量包含不雅成分的笑话,容易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突,因此他进行了精心筛选与适度删减。纵观其译本,翟理斯所剔除的内容大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是那些围绕两性关系展开的诙谐段子,其中不乏对性暗示的隐晦描绘,这类笑话因文化敏感性和道德观念的差异而被省略;其二,涉及排泄物等不雅元素的笑话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被视为低俗,也被审慎剔除。遇到上述问题,葛浩文巧妙地含蓄表达,既确保了故事情节的连贯完整,又精准传达了原著的深层含义(庞学峰,2018)。

例2:十五年风雨狂心魂激荡,我奶奶由黄花姑娘变成了风流少妇。

译文: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of romantic, s

oul-stirring adventures had turned

her from a virginal teenager into a bold young woman.

原文中的“黄花姑娘”是中国民间对于未出嫁女子的称呼,葛浩文将它处理为还带有纯贞的少女,“teenager”正好对应少女出嫁时的年龄。而原文的“风流少妇”是有些带有性意味的揶揄称谓,以男性视角来看,奶奶年轻时貌美,为人妇之后也是有一番魅力,但是葛浩文将“风流”处理为“bold”,意为:大胆自信。结合原文,奶奶主动对余司令喊话放过任副官的时候,可以看出奶奶是个有血性和冲劲的人,这样的处理也是对奶奶这一人物形象的再次塑造,使其多了一丝女中豪杰的勇敢。

3.2 人名的翻译

原作中反复出现的名词的不同处理,也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和理解,如地名或人名的译名需和原文风格、内容相吻合,在阅读的时候才不会让读者感到怪异。小说中的角色大多都是农民,而乡间一直有“贱名好养活”的取名原则,简单、易记的名字便于日常称呼和交流。如奶奶家的老长工“刘罗汉”,葛浩文将其处理为 Uncle Arhat 或 Arhat Liu。“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梵音译(Arhat),是佛教术语,一般指断绝一切欲念的僧人。葛浩文联系后文刘罗汉为大义而死的悲壮结局,望其能够和“罗汉”一般死后超脱,吻合了角色性格,也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

“余大牙”,即爷爷余占鳌的舅舅,结合人物特征,葛浩文将其处理为“Big Tooth Yu”,保留其姓氏,但是将其置于名字结尾,颇像西方的名字结构,名在前,姓氏在后,又将其外号直译过来,两相结合,一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形象就跃然于读者面前。

4 译者与出版商:内容的取舍

作品在经过翻译润色等一系列加工后,在面世之前,还需经过出版社的审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市场经济秉持“有利可图”的行为模式,因此出版社视市场为风向标,受市场欢迎的便多加刊印,销量惨淡,书店就会将相关图书下架。葛译的《红高粱家族》于1994年出版,而当时的美国读者更喜欢看图文并茂的图书或者图册(李顺祺,1994),英文图书才是他们最常阅读的。翻译作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比更小,深层原因是霸

权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与仇外主义,即使是优秀的译者亦容易埋没于市场的啃噬(周玲琪,2023)。《骆驼祥子》的翻译就是一个例子。

面对这些问题,葛浩文选择符合市场葛浩文对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翻译选材上基本符合他们的审美取向和阅读期待:“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中国的历史小说也颇受欢迎”(季进,2009)。除此之外,葛氏提到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罗屿,2008)。而《红高粱家族》正是符合西方读者审美的优秀作品,夸张地描写了日本鬼子逼迫孙五活剥罗汉大爷的场面,血腥震撼;入木地刻画了不同民间抗日地方武装各自为阵的局面,混乱无序。

《红高粱》的出版社企鹅出版社是当时美国出版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出版商。美国1992年图书零售额达160亿美元,约120亿美元属美国本土出版公司占有,企鹅出版社占3.2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英文书籍。尤其可见,葛浩文对原著的删改,再加上出版社的巨大市场,才得以推动《红高粱》得以在美国市场获得巨大成功。

5 结语

本文首先分析了译者主体间性的提出与内涵,剖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其次笔者分析了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以及对作品选择的原因。之后,笔者举例说明葛浩文如何选择归化异化等不同翻译策略以及删减等方法,力求让读者获得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体验。最后分析了当时的美国图书市场,阐述了译者如何为了适应市场、扩大受众而做出改写,助推《红高粱家族》进入外国读者的视野。

通过分析,我们得以洞察葛浩文在翻译《红高粱家族》时所展现的高度责任感和专业素养。他不仅深刻理解原作的文化内涵,更精准把握目标语言读者的期待与市场的需求。葛浩文的翻译成就,无疑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翻译家在全球

化时代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Gadamer, H. (2006). *Truth and Method*, Joel Wein sheimer & Donald G: Marshal, (tran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 [2] 高方, 许钧. 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 中国翻译, 2010, 31(06): 5-9+92.
- [3] 胡安江.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 中国翻译, 2010, 31(06): 10-16+92.
- [4] 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6): 45-56.
- [5] 罗屿. 葛浩文: 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 新世纪周刊, 2008(10): 120-121.
- [6] 李顺祺. 中国图书如何进入美国市场[J]. 中国出版, 1994, (11): 33-36.
- [7] 莫言, 《红高粱家族》(Redsorghum), Howard Goldblatt 译, 英国: 企鹅出版社, 1994.
- [8] 庞学峰. 翟理斯的翻译对“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J]. 中国翻译, 2018, 39(04): 36-41.
- [9] 许诗焱. 葛浩文翻译再审视——基于翻译过程的评价视角[J]. 中国翻译, 2016, 37(5): 88-92.
- [10] 张孝红. 基于主体间性的文学翻译审美关系研究[D]. 宁波大学, 2019.
- [11] 周玲琪. 葛浩文翻译模式探究——兼论“借帆出海”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3, 30(06): 33-40.

作者简介: 薛晓宇(2000.9.14), 女, 汉族, 山西省忻州市人, 硕士生, 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攻生态翻译学。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昌市邮编 330099

基金项目: 项目出处“江西省2024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编号: YC2024-S885)部分研究成果。